

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潮龙起

【提要】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研究先后出现了三大主要的理论范式,即早期的同化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理论和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散居论、全球化理论和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与美国社会的时代变迁、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者本身社会立场的转换密切相关。本文根据不同阶段的指导理论,对于自早期直至今天美国史学界对华人移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既应该认识到各种理论的长处,也应该认识每一种理论的缺陷,要理解美国华人经历的多样性,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兼容并蓄,综合运用各种理论。

【关键词】美国华人 理论范式 同化论 新社会史 后现代

根据人口统计,2007年美国华裔人口达354万,是美国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且占世界华侨华人人口总数的1/10左右。不可否认,当今美国华人是国别华侨华人中最有活力、最具科技实力的群体,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华人数量巨大增长,还表现为美国华人素质的明显提高。与美国华人社会变化相一致,近几十年来,美国华人已成为国别华人中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其研究也取得相当成绩,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更为全面,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本文在此试图对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研究的理论范式作一回溯和总结,以图对美国华人研究能有更好的把握,并对世界其他各国华人研究有所助益。

—

自19世纪中叶华人成批踏上美国领土时,美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外交家、劳工领袖、政治家就开始关注他们,撰写一些有关他们的文章、报告或小册子。19世纪传教士的著作把美国华人描写成需要拯救的异教徒,而那些新闻记者则用一些带有异国情调的术语来描写华人不可同化的特性。早期美国政府和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以欧裔白人占主导的社会,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应接受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站在多数民族、统治民族和本地民族的立场,要求其他少数民族、被统治民族和外来民族屈从于他们,把同化看成是解决民族问题最理想的办法。实际上,自华人来到美国开始,美国人就根据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标准,以同化的观点看待和要求来自东方的华人。

在这种情况下,主导美国华人研究的模式首先就是同化模式。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华派,主要是一些政客、律师、劳工领袖等,如斯达(M.

B. Starr)、费威尔 (Willard B. Farwell)、惠特尼 (James A. Whitney) 等。他们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和美国华人的著作,如《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国国内外的华人》、《华人与华人问题》等。他们认为,华人是苦力和契约奴,是异族的、卑贱的、堕落的。华人崇拜死人,而不信基督。他们没有道德修养,蔑视美国法律,保持中国风俗,是美国社会中的危险因素。他们不肯把妻子儿女带到美国,对居住地毫无兴趣,不想成为美国公民。华人与欧裔美国人大相径庭的,是永远不肯被同化、不可被同化的外国人,华人的存在对白人的特性与福利构成了危害。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排斥。

另一派是曾在华服务的传教士和外交官等,如威廉·斯皮尔 (William Speer) 牧师、欧迪斯·吉布森 (Otis Gibson) 牧师、前驻华公使西华德 (George F. Seward) 等。他们撰写了《最古老和最新近的帝国:中国和美国》、《美国华人》、《中国移民:社会经济方面》等作品。他们同情和赞成华人移民,认为华人不是苦力移民,华人具有勤俭、聪慧等良好品质,能够理解和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宗教信仰。他们抨击美国排华分子无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对华人进行的无端侮辱和歧视,以及驱赶和屠杀的暴力行为。他们为华人移民辩护,认为华人的吸毒、赌博等恶习不比白人恶习危害大,华人拥有公民权并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反对华人移民背离了美国政府赖以建立的信念:美国由于其先进的民主制度,能够平等地吸收并同化不同民族的移民于一个大熔炉之中,而其经济的长期繁荣则依赖于移民的持续流入。

从本质上讲,这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华人能否被以欧裔美国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同化,华人移民是否需要受到禁止或排斥。在 19 世纪后期,在当时充斥整个美国社会的排华氛围的影响下,主张华人不能同化的反华派占有绝对优势。

进入 20 世纪后,虽有一些有关美国华人的书籍出版,但它们大多以堂战和妓女这些耸人听闻的内容为主题,往往把华人作为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对象加以讨论,且在叙述上不够准确,并带有明显的偏见,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著作。

1909 年,美国社会学家玛丽·柯立芝 (Mary Coolidge) 撰写了《中国移民》一书。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华人的学术研究作品。自此之后,来自美国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从学理上探讨早期的美国华人和美国的排华运动,多以同化的模式来考察华人的移民经历。不同于 19 世纪后期的著述,这些学者大多采取比较客观的立场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很少直接赞成或反对华人移民,而是注重史实陈述和分析。他们关注华人在迁徙中遇到的生存适应问题,华人融入美国社会所做的努力,以及最后如何克服逆境取得胜利。这类学者也关注华人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强调华人与其他移民的相似性以及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可能。如柯立芝深入探讨了加州排华运动兴起的原因,抨击了美国历史上的排华势力和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关于华人的同化问题,她认

M. B. Starr, *The Coming Struggle*, San Francisco: Bacon, 1873; Willard B. Farwell, *Th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San Francisco, 1885; James A. Whitney,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Tibbals Book Co., 1888.
William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incinnati: National Publishing Co., 1870; 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Cincinnati: Hitchcock & Walden, 1877; George F. Seward, *Chinese Immigration, in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81.

为华人勤劳朴实,做事耐心,行为得体,适应能力强,会成为良好的公民。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相比,他们的美国化速度更为迅速。

20世纪前期,在排华法的限制下,随着移民美国华人数量的大幅减少,土生华人的数量和比例则逐渐增长。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880年美国的土生华人只占美国华人总人口的1.1%,但到1920年时则达到30.1%。作为土生华人,华裔青少年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社会,在语言、思维、生活方式及社会举止上已经美国化,并视美国为自己的祖国,应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但与其父母一样,他们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歧视,如在学校中受到排斥,在公共场合和娱乐场所受到欺辱,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排挤。土生华人的这种情况引起了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兴趣。他们在1924至1926年间开始对美国的亚裔移民特别是对美国土生华人的同化过程和意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试图验证他们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论,即外来移民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要经历这样的四个阶段:接触、竞争、适应和同化。威廉·史密斯(William C. Smith)、埃利略·米尔斯(Eliot Mears)、R.D. 麦肯基(R. D. McKenzie)等学者发表论著,同情华人第二代所遭遇的困境,劝告土生华人降低他们的期望并接受社会隔离的现实。

受同化论模式的影响,一些学者也从学理上探讨它的对立面,即华人不能同化的原因。1952年,萧振鹏(Paul C. P. Siu)撰文论述了早期美国华人的“旅居性”(sojourn nature)问题。它是与“定居性”或本土化、美国化和同化相对立的。他认为,早期美国施行排华法,歧视和排斥华侨,这些因素致使美国华人采取一种暂居心态,即他们坚持自己族群的文化遗产,倾向孤立居住,他们的活动兴趣局限于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事务,而不想全身心参与居住国社区生活。1964年,冈瑟·巴斯(Gunther Barth)则发表《苦力:美国华人史,1850—1870》一书,进一步完善了萧振鹏有关华人移民的“旅居性理论”,并认为这是排华法通过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早期美国华人都有这样一种梦想,以为他们将在美国挣钱,然后带着积蓄回国,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将美国看作短期逗留的佳地,而不存在定居美国的心理倾向。华人的这个奋斗目标,把自己与加州的其他移民区别开来。华人绝大多数是侨居者,而其他移民则是定居者。巴斯也将美国白人对华人的敌对和歧视归咎于华人拒绝同化美国。他认为,中国侨民所追求的这个狭隘目的,影响了美国对华人的接纳。他们作为侨居者在美国留下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人同美国人的关系。巴斯的著作出版后,“旅居性理论”长期主导了美国华人史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直接冲击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制度,强有力地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意识。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少数族裔开始对自己的族裔身份进行重新审

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William C. Sm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Oriental in America*, Honolulu: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7; *Americans in Process: A Study of Our Citizens of Oriental Ancestry*, Ann Arbor, MI: Edwards Brothers, 1937; Eliot Grinnell Mears, *Resident Orientals on the American Pacific Coast: Their Legal and Economic Statu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7.

Paul C. P. Siu, "The Sojourner",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8, No. 1, Jul., 1952, p. 34.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 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视,并对之产生一种种族自豪感。这一时期,一批经过高等学校专门训练的亚裔学者崭露头角,以局内人的视角来观察美国亚裔社会。他们挖掘史料,出版著作,成为这个领域内一支重要的力量,推动了亚裔研究迅速发展。像陈素贞(Sucheng Chan)、丹尼尔(Roger Daniels)、塔卡基(Ronald Takaki)等从不同角度探讨华人的历史,也在其学术著作中表达了那些过去沉默的华人的声音。这些学者中有不少是美国土生华人,他们运用同化论的理论模式,将自己看成华人社会的代言人,试图在华人社会和美国社会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并从美国华人内部解释他们的经历。他们也强调华人移民的美国性特征,他们同化的程度,他们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望。他们这样做的同时,淡化了美国华人族裔特性的持续性,忽略了他们经历中跨国的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学者周敏在美国亚裔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她在《唐人街》一书中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角度和敏锐的眼光,对经典的同化论进行了反驳。她认为,作为少数族裔集聚区的唐人街并没有按照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那样,其最终结果将是随着族际互动的增多和族裔特性的弱化和消失,也会不可避免地衰落和消失。她通过对纽约唐人街的实证研究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一百多年来,唐人街仍充满生机和活力,主要在于唐人街为很多华人新移民提供主流社会无法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也使华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习俗,而不至于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丧失殆尽。周敏还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波蒂斯(Alejandro Portes)创建了“多向分层同化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对传统的同化论进行挑战。作为一种中层理论,它主要探讨后工业化时代移民复杂的适应过程。她将移民的适应过程置于分割的、不平等的主流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试图解释什么因素决定某种移民社群同化到美国社会的哪个阶层。

总的说来,同化论的理论模式主导了早期的美国华人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前,该模式带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未能认识到美国华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把华人描述为种族歧视的被动受害者,或是关注主流社会对华人在美国的出现有何看法和反应,而忽视对美国华人社会本身的认识。同化模式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它在美国民族国家的视角下理解美国华人的经历,忽略了中国和全球性因素对美国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虽然后来有一些华人学者开始介入这个领域,利用美国华人社会内部的中文资料,关注华人对自身历史的表达和认识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但直到民权运动兴起、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新社会史理论、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理论兴起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 - 1910*, Berkeley, Calif., 1986;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1988;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1989.

Betty Lee Sung, *Mountain of Gold: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7; Thomas W. 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nd Its People*, San Francisco, 1989.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260—263页。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30, Nov., 1993, pp. 74 - 96; Min Zhou,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3, 1997, pp. 63 - 95.

二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以及新左派的活跃,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受法国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新社会史。在研究内容上,新社会史拓宽了传统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人和少数族裔等社会边缘群体给以特别关注,开创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别史、族群史、社区史等领域。在研究视角上,新社会史倡导“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观,提出了以“整体史”代替“事件史”的观点,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各种事件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它注重口述史,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特别是新的数理分析模式和比较研究方法。

在美国民权运动和黑人等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的影响下,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反抗主流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制度,抗议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和剥削。美国的亚裔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初创的美国华人研究与当时的“民权运动”遥相呼应,向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挑战,试图促使他们认识并接受美国华人的历史。一些华人学者开始运用新社会史理论来考察和理解美国华人的经历,关注华人与白人之间的族际关系,反驳过去流行多年的对华人的看法,批评了美国过去对少数族裔采取的不公平政策。他们发掘大量新史料,注重美国华人自己的声音。在新社会史的理论视角下,美国华人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拓宽,研究的课题更为精细,问题分析更为透彻深入。

首先,关于过去人们忽视的美国华人妇女的研究,近几十年出现了不少优秀成果。成露西、唐本森(Benson Tong)、乔治·佩佛尔(George Anthony Pfeffer)、杨碧芳、包小兰、令狐萍等发表论著,对早期美国华人娼妓、普通家庭妇女、车衣女工、华裔之妻等不同类别的华人妇女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她们有力地解释19世纪美国华人娼妓产生的原因,以及她们在美国遭遇的苦难,指出早期美国华人社区中性别比例极端失衡的原因并不在于华人妇女,而在于美国的敌对性限制政策;华人妇女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华人妇女不仅努力保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在异地生根开花,而且还入乡随俗,吸取美国文化的营养为己用,并能通过自己的拼搏,跻身于美国商界、政界和学界。这些学者在分析时,注重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新社会史的整体史观和比较方法,令人信

Lucie Cheng, "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Signs*, No. 1, 1979, pp. 3 - 29; 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4; George Anthony Pf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Xiaolan Bao,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948 - 199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服地解释华人妇女的独特经历。如成露西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早期华人娼妓制度形成和运作的机制;唐本森、杨碧芳、包小兰等在研究华人妇女时,将她们置于中美两国的广阔历史背景中以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

其次,在华人劳工史的研究上也取得很大成绩。早期美国华人大多为劳工阶层,自然劳工史就成为新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学者邝治中撰写了两本关于纽约唐人街的专著,侧重研究1930年至70年代末纽约唐人街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冲突。他把唐人街看成劳资和阶级冲突之地,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深受唐人街外的种族和唐人街内阶级的双重压迫。于仁秋的《救国自救》则是一个关于华人社团——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个案研究。他通过此项研究展示了种族和阶级怎样相互交织,纽约唐人街的传统精英在面临华人社会内部的反抗时,如何通过调用华人的族裔意识来压制华人劳工的阶级意识,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在劳工方面,还有陈素贞、梁静源、萧振鹏、严祖贵(Tzu-kuei Yen,音译)等对早期加州华人农工、芝加哥洗衣工和铁路工人的研究。这些研究阐述了不同类型华人劳工所处的工作环境,也反映其受当时学界流行的“劳动阶级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学者王秀惠则从种族关系和社会性别史的角度考察了二战前美国大陆华人男性进入洗衣、车衣、家佣这些属于“女人工作”行业的经历。她认为,美国华人是在性别分化的运作之下经历了种族歧视,但男性华人也以抗争罢工的方式为自己寻求公平与尊严。王秀惠的著作作为我们解读二战前美国华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充分说明种族和性别这两个因素如何相互建构而影响华人地位的,展示了新社会史理论分析的前景,也引导我们需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解读美国华人史。

再次,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大量的成果问世。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随着美国华人族裔意识的觉醒,各地华人历史学会的建立,很多华裔学者着手探讨当地华人社区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包括社区华人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家庭、社团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社会信仰、社会风俗和社会问题等。一批涉及大小不一的华人社区且有研究深度的著作涌现出来,大的华人社区如在旧金山、纽约、檀香山、洛杉矶、波特兰、奥克兰、芝加哥等,都有专著进行研究;一些华人人口不多的社区,如在圣路易斯等也有专著对之进行探讨。

在新社会史理论的视角下,美国华人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第一,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拓宽。一些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领域,如早期华人妇女、华人劳工、华人社会信仰等,受到重视,过去人们知之甚少的早期东部华人的历史,也受到关注。第二,一批华人史料被挖掘出来,特别是一批反映华人自身经历、家庭和社区变迁的口述史料通过录音和文字记录得以及时抢救并保存下来。第三,运用新社会史的理论视角重新解释了美国华人史的某些方面,特别注重倾听华人自己的声音,关注美国华人自身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邝治中:《纽约唐人街:劳工与政治,1930—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新唐人街:当代美国华人社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于仁秋:《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

王秀惠:《种族歧视与性别——二战前美国大陆男性华人之经历》,台湾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

的认识和解读,以及他们为自己权益进行的积极斗争。可以说,新社会史理论弥补了同化论模式研究的不足。但新社会史理论的学者在拒绝同化论的理论模式时,往往认为美国华人的历史更多的是一部美国人的历史,华人移民是一种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美国的线性历史。这如同化论模式一样,它在解释美国华人经历时,也不大关注美国华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华人的联系。

三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增长、多元主义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后冷战时期世界局势从对抗走向缓和,少数族裔的经济利益及文化特性逐步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且其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多重性也获得谅解和接受。对此,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过去的民族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并借用国际学术界流行且相互关联的散居论、全球化理论和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美国华人全球的、跨国的社会实践。

首先,与新社会史对立的是散居论的研究方法。散居论(diaspora)原本与犹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暗含着被迫迁移、群体的苦难、顽强保持下来的特性、对祖国和家乡的渴望等。20世纪80年代后,它被学者赋予丰富的含义,代表着任何地理上分散而由情感、文化和历史维系在一起的族群,代表着多样性、流动性、不受约束、血统混杂、现代性的混乱,或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失去中心的特征。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美国华人的学者主要是以中国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来审视美国华人的经历,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延续性以及与中国联系的持久性。在这种视角下,它所关注的主题是美国华人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美国华人是中国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力量。近年对美国华人与其祖籍国间的关系又有一种新的认识,它将美国华人视为一种独立的群体,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它一方面认为美国华人保持着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但同时又持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这样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和美国的认知。

其次,与散居论相关联的全球化理论也被引入美国华人研究之中。他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角,采取了世界体系理论或环太平洋的区域视角来审视美国华人的经历。林健(Jan Lin,音译)在《重构唐人街:民族聚集区和全球性变化》一书中,将纽约唐人街的社会变迁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资冲突和互动中加以考察,详细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华人资本进入唐人街对华人银行业和地产业的影响。成露西则考察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形成对美国华人物质环境和自我认同的影响。她全面探讨了美国华人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认为,在环太平洋经济圈中,美国华人既是受惠者,又是受害者;既对全球性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对此形成挑战。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Jan Lin, *Restructuring Chinatown: Ethnic Enclave, Global Chan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Lucie Cheng,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in E. Hu-Dehart ed., *Across the Pacific: Asian-Americans and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再次,随着移民跨国主义理论的兴起,一批学者也将其引入美国华人研究当中。他们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来解释和探讨华侨华人散布海外的原因和动机,迁移的模式和途径,在海外的生存、适应及发展,维持与祖籍国的联系的原因、动机、模式与途径,身份认同的建构与转变,如何调整居住国的族群关系等问题。他们对传统华人研究中的民族国家思维提出批判,并以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视角,试图以人口流动和离散为起点,以跨国网络而不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中心,探讨不同时空背景和不同类型的美国华人的流动性、混杂性或后现代性的构造特征。美国学者亚当·麦克翁(Adam McKeown)精辟地指出以民族国家为视角来研究海外华人的局限性。他说,以中国或华人居住国的民族国家视角不会完整地勾画出华人移民过程及网络的连贯现象,而只能对华人移民做出相互矛盾的评论。他在研究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华人的一本专著中指出,我们应当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将华人移民视为一种全球现象。他同时指出,强调全球化不应当将全球的力量置于地方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把跨国主义理论与新社会史理论结合起来,探讨美国华人的跨国家庭、跨国社团和跨国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如亚当·麦克翁对美国排华法时期华侨跨国家庭的研究;美国华人学者赵小建对1940—1965年间的美国华人家庭的研究;美国华人学者刘海铭对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广东开平一个中医移民家族的研究;诺顿·惠勒(Norton Wheeler)对当代美国华人社团的具体分析;徐元音(Madeline Hsu)对广东台山人跨国社区的研究等。

除上述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外,跨国主义理论还关注美国华人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实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民权运动后文化研究的兴起,跨国主义理论也被引入这一研究领域,涉及的研究课题包括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各种艺术表达的形式和意义、意识和信仰、话语和宗教仪式等,并已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如陈勇、陈社红等以跨国主义视角分析了早期美国华人认同的形成机制。陈勇在书中深入探索了美国华人自己所认知和体验的世界,而不是从非华人的视角和背景来考察他们的历史。他认为,许多美国华人不单是将其经历放在美国社会中加以理解,而是放在跨越太平洋世界的环境中理解。他系统阐述了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1999, pp. 306 - 337.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 - 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Adam McKeown, "Transnational Chinese Families and Chinese Exclusion, 1875 - 1943", i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Winter, 1999, pp. 73 - 110; 赵小建:《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0页; Liu Haim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Family: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Norton Wheeler, "A Civic Trend within Ethnic Transnationalism? Some Insights from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Global Networks*, No. 4, 2004, pp. 391 - 408.

Madeline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 - 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0 - 123.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 - 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 261 - 264; Chen Shehong, *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支撑旧金山华人在逆境中生活和工作的动力,以及他们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和历史记忆中来认识并表达其在美国生活经历的意义所在。他描述了旧金山华人怎样维护自身的文化特性,以证明全盘同化的社会实践、政治意识形态和论调都是无效的,也是注定失败的。在跨国主义视野下,移民、宗教和跨国网络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肯尼思·格斯特(Kenneth Guest)细致地探讨了纽约唐人街和中国的宗教社区之间存在的移民生存所需的物质和情感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是跨国的信息交流、福州移民对家乡有关工程的资金支持以及回国旅行。在跨国主义理论的视野下,他们把美国华人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看成是跨国的、复杂的、多变的。

可以说,美国华人的跨国主义研究有力地挑战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同化论研究模式,反映了地方和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力量,阐述它们塑造了美国华人历史以及华人通过跨国网络对这些力量的创造性适应。它把美国华人社区的特征概括为一种具有活力的、流动的和灵活的全球网络,把美国华人放在单一国家之外的一个更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显示出跨国主义理论的前景。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华人的生活和意识是多面的、复杂的,不是一种理论所能包含或说明的。以单一的理论为基础,不论它是长久不衰的同化论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多元主义等理论,还是时下流行的跨国主义理论,每种理论只能解释美国华人经历的某一方面。

综上所述,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研究先后出现了三大主要的理论范式,即早期的同化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理论和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散居论、全球化理论和跨国主义理论。可以说,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是与美国社会的时代变迁、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者本身社会立场的转换等密切关联的。我们在研究美国华人时,应认识到各种理论的长处和缺陷,需要对之兼容并蓄,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不同理论范式来理解美国华人经历的多样性。

(作者潮龙起,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510632)

(责任编辑:姜 芃)

(责任校对:董欣洁)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Method of Landscape: The Case of the Humanistic Historical Map of Shanghai // Su Zhiliang Wu Junfan

Due to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ubjec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lacks rationality, and therefore, not only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study neglected its historical attribute, but als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landscape study is absent.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s insist on the great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up the academic frame of special historical study of landscape and also make an exploration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re even includes a case of the humanistic historical map of urban Shanghai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the study of landscape histor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re will be another broad innovative space for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regional and urban history if the new concept of landscape history can b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inter-subject method, database and GIS technology.

The Change of the Theoretic Pattern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Americans // Chao Longqi

Three major theory patterns successively appeare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namely the theories of assimilation model, neo-social history model rising in 1960s, and postmodernism model——disperalism, globalization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change of the theoretic pattern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merican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scholars' posi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riticizes the studies of U.S. on Chinese Americans for last hundred years.

From Geography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British Geographer Ian Simmons // Jia Jun

Ian Simmons, a British geographer, has been engaging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His works present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lose combination between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From 1960s to 1990s, his interests chang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with an ecological view to the cultural biogeography, and eventually turned to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rocess firstly, and then analyze the momentums of this shift from soci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s.